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农工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由邓演达、谭平山等创建，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从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到中国农工民主党，数易其名，显示了其探索道路的曲折与艰辛。

主张平民革命 开展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首次提出了平民革命的思想。1928年3月，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分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其他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张曙时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暂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邓演达回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宣读了《我们的信条》，即（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

农工党的民主建国之路

□ 孙 信

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即“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会议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由于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亦被称为“第三党”。

临委会成立后，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积极开展组织、宣传等特别是军事工作。邓演达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亲自拟定了《军事运动方针》，致力建立平民群众自己的军队。一方面组织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另一方面面对与其有历史联系的军队和受国民党压制的地方杂牌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在短时期内，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争取到了陈铭枢、陈诚、杨虎城、邵子举等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支持。邓演达的一系列活动，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蒋介石下令悬赏30万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为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授课时，由于叛徒陈敬斋告密，不幸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一再派人劝邓演达与自己合作，并许以高官，

但都遭到了邓演达的严词拒绝。特别是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邓演达，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并痛下杀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盛赞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推动团结御侮 投身抗日战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委会通过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邓演达牺牲后，党组织一度涣散，临委会商定党务暂由黄琪翔主持，活动才逐步得到恢复，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活动。1933年11月，临委会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策动十九路军和其他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临委会宣告解散，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

1935年11月10日，临委会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讨论国内外局势和重振党组织的问题。会议认为由于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中日矛盾

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只有组织起来，坚持抗战，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才有出路。为此，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团结全国，联俄、联共，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等主张。农工党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标志着农工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解委会在香港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实行民主政治、武装抗日民众、释放政治犯等八项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加强同中共的合作，1938年2月，解委会由章伯钧、彭泽湘与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加强合作，共赴国难。会谈后，解委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表达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

种协助”，从而双方加强了合作关系。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解委会坚定站在中共一边，斥责蒋介石制造反共事件，并作为发起者之一，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开展。

在抗战期间，解委会坚持与中共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行径，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抗战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和军事工作。如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直接参加了淞沪抗战、枣宜会战和滇西反攻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反对独裁内战 参与筹建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解委会于1945年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强行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与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为体现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基础以及党的历

孔子为什么讲“以身为本”？

□ 李建仁

以仁为本

《论语》中有多处记载孔子讲到“仁”。譬如，“里仁为美”“泛爱众而亲仁”“当仁不让于师”“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可以说，“仁”是孔子核心思想的全部精义所在。换言之，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应该提出“以仁为本”者。然而，孔子没有成为首创者。

《诗》云：“赳赳武夫，国之干城。”自古言兵法者，必推司马穰苴与孙武。《孙子兵法》现仍保存完好，故孙武被后世誉为“兵圣”；而《司马穰苴兵法》今已不可见。然而，就是这部残缺的兵书《司马法·仁本篇》讲道：“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既然说“古者……之谓正”，可见首先提出“以仁为本”这一说法者，至少在司马穰苴以前。虽然也不能排除古代兵法中早已有“以仁为本”这层意思，只是尚未有“以仁为本”这个具体提法，但至晚在《司马法》中已然具体地提出“以仁为本”这个概念。司马穰苴，本名田穰苴，是春秋末期齐国田氏的支庶。齐国相国晏婴向齐景公保荐其率军打仗，“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凯旋后即升任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尽管《史记》中有《司马穰苴列传》，然其生卒年月不详。参照推荐他的晏子比孔子年长近三十岁，亦可推见穰苴应该比孔子要年长一些。所以说，司马穰苴已先于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本”。

以人为本

其次，仁者爱人。“仁”的核心是“爱人”。《论语》和《礼记》中亦有多处记载孔子讲到“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既然“仁”的核心是“爱人”，那么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应该提出“以仁为本”“以人为本”者。但是，孔子也不是首先提出“以人为本”的人。

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管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史称管敬仲，后世尊称管子。他是一位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卓越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政治哲学就是实用二字，故深知得人之重要性。他在《管子·权修》中讲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并在《管子·霸言》中进一步申述：“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正是在《管子·霸言》中首次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去世于公元前645年，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公元前551年，孔子才降生。即使天纵之圣，也再没有机会首先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

以民为本

再者，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孔子一生讲“仁”行“仁”，强调“爱人”，自然也包括爱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可以看出，孔子是多么地强调并重视民本思想啊！所以说，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应该提出“以民为本”者；然而，并不是这样。

稽考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由来远矣。《诗经·商颂·玄鸟》即有“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尚书·五子之歌》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子》四十九章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左传·哀公元年》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等语。是啊，国家力量具体体现的就是人民的力量：“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所以孟子才把“民本思想”强调到空前高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唐太宗才讲：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据现有史料记载，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者，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比孔子年长近三十岁。当孔子三十五岁到齐国拜谒齐国国君齐景公时，晏子已是年过六旬的齐国老相国矣。可以看出，这三个重要哲学范畴均出自齐国。不用说，孔子也不是最早提出“以民为本”这一民本思想的人。

以身为本

孔子自我评价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有黽勉、努力、用功之义。“好古敏求”，则是喜好古人的思想和学说，并去努力地探求它的深意——即“道心惟微”之所在。明代大儒王阳明对之解释得很到位：“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孔子还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宋代大儒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考求孔子一生对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删《诗》《书》，订《礼》《乐》，赞《易》著《春秋》”，其他五经只是整理删订阐发“故有”之经典，而“创作”则只有一万八千字的《春秋》一部而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述而不作”为何“不作”？大概是因为孔子生活的年代所能见到的“故有”文本，實在是太灿烂太经典了吧？譬如仅仅以四个字呈现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和“以仁为本”，即是很好的范例。

所以，孔夫子在“以……为本”为范式“造句”时，就“造”出了一个“以身为本”的全新理念。据《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记载：“孔子曰：‘……故君子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情迹畅而及乎远，察一而关于多，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孔子讲“以身为本”的前提，是“君子南面临官”，即是对做官的人来说的。“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者也”，讲的是做官的

首要条件是做人，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好自己。

其实，不仅是做官，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做好自己都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汉代韩婴《韩诗外传》记述孔子的两位高足曾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无）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无）患至而后呼天。’子贡曰：‘何也？’曾子曰：‘内疏而外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此三言真可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是值得世人终身记取的至理名言。其中，“身不善而怨他人”，不就是说那些不能“以身为本”而只管把自己搞砸事情的责任统统推给他人的人吗？其结果不仅只是一句轻轻的“不亦远乎”，甚而还会“患至呼天”，肠子悔青，噬脐莫及。

数千年来，儒家所一直倡导奉行的“修齐治平”，就是从“修身”即“以身为本”开始的。任何一个人，只有从做好自己开始，然后才有可能做好一切。故《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同“型”，即标准和模范。大意讲的就是以自身的良好品格和行为，为妻子兄弟树立榜样，并从家庭一直影响到邦国的治理。所以《孟子·尽心下》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讲的也是“以身为本”、身行正道的重要性。不然的话，无论何等等级的人物，口是而心非，言清而行浊，连家人和身边人都不会相信他，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也。

所以说，孔子提出“以身为本”，并非只是“造”一个“以……为本”的句子充数而已，而是强调，从政者首先必须从自我出发，正心诚意，做好自己，向我看齐。所以说，“以身为本”是根本之本、核心之本、本中之本。



（上接1版）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 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深刻说明，斗争不仅要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还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和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论，切实认识和处理好斗争实践中各种重大关系。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清醒地认识到斗争是客观普遍存在的，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动斗争和善于斗争。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所有事物和事物的所有方面，也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斗争也就是普遍存在的永无止境的历史活动，回避斗争和放弃斗争就是放弃存在和发展的权利。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其次，坚持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斗争实践中不仅要统揽全局，还要抓住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

最后，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在整个斗争过程中要坚持斗争的价值性原则。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战略目的，更好造福人民。因此，在斗争中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 在知行合一中不断增强 斗争本领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史传统，会议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提出了“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会议认为自第二次干部会议以来采取联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公开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阵线，要与“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民主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农工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策反蒋军起义、收集军事情报、组织护厂护校等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48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表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人。9月24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发言指出：“我们农工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从此，农工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道路。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和方法论，善于把远大目标、奋斗目标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肩负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这里关键是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把认识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道义力量和揭示规律的真理力量，在实现造福人类的伟大实践中释放出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不仅具有斗争精神而且具有斗争本领，才能够作为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战士，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上、一言一行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锻炼才能够培养和造就。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融会贯通，特别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掌握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够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真正做到在行中知，在知中行，在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完善自我，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更好造福人民。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指出的：“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